

走出中世紀

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

朱維錚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讀維錚的書，如對作者本人，音容意氣充溢字裡行間。他氣盛文暢，有時竟是『使氣以命詩』。但理據充足，合於《詩》『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名物考史，詩文證史，非其所長，也非其所好。他相信歷史的陳述中可以發現歷史的真相。」他的兩篇（編著註：收入在《走出中世紀》（增訂本）和《走出中世紀二集》）「接而相續的六萬多字的長文《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就是這種歷史陳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見出維錚治史的卓識與功力。讀時我心志清醒，眼睛極累，卻又不願罷手，只好一氣了之。即使對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筆者，也無法不被他的理據情采所折服。」

走出中世紀

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

①

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那麼多一度繁榮過的文明都已消逝不見了。它們所經過的「死亡之門」是甚麼呢？

——湯因比《歷史研究》

—

中國有過漫長的中世紀。形容它漫長，很有用語模糊的嫌疑。但如果熟悉學術界關於古史分期問題的爭論，那就可知對於中世紀的時間開端，西周

封建說同魏晉封建說的兩種估計，差距竟達千年以上。不過，即使承認公元三世紀中國社會才開始步入封建主義歷史時期，那麼中國的中世紀的開端，也早於西歐兩百年以上，而下至中國學術界通行的終端說法，即上個世紀的初期，也長達一千五百年。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個時間界域，豈不算漫長麼？自然，在我看來，中世紀的開端還要早些，應該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朝統一諸國時正式起算。理由呢？這裡不是討論的地方，好在那是一種相當流行的見解，早經反覆論說。

二

然而，中世紀並非單純的時間界定，還是一種空間界定，更恰當地說，

它屬於時空連續性的相對論界定。以往在中世紀始於何時間題上所以長期分歧，乃至爭論變成拉鋸戰，原因固然很多，但至少在方法論上有個通病，那就是牛頓式的時空概念，程度不等地籠罩著我們的討論。時間是線性的，因而說起時代特性，總是非「進步」即「倒退」。空間是歐氏幾何的，因而忽視歷史的區域特性，總把只是帝都王畿的時代現象無限制地拓展為此時中國的空間共性。當然也注意到民族特性，卻往往忽視這種特性只有從時空連續性的角度才能獲得合理性的說明。因而，用漢族某一區域的時代現象，作為衡量同時異族「先進」抑或「後進」的參照系，不見得比「漢化」抑或「胡化」之類舊尺度更正確，後者其實也是把同時性絕對化的結果。我們過去完全否定地理環境決定論，不好說是全錯，但因此而不敢承認或者不想探討歷史運動的時空連續性，那就中邪了。當年首先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聯

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這一點上恰好體現了作者只會在對立面不相容性的「非此即彼」的僵硬框架中思維，而恩格斯早就明白批評過這種思維方法的謬誤。

三

那麼，要從時空連續性的角度探討中世紀的歷史，難道沒有可能妨礙人們對歷史的整體認知麼？難道沒有可能導致人們對中世紀的普遍存在發生懷疑麼？可能的，假如忘記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所作的方法論啟示的話。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理論的闡述上，總是用英國作為主要的例證，「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是更容易研究的。並且，

在經濟形態的分析上，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那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二者。」〔二〕就是說，因為英國那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所在，是資產階級社會已經發育的身體，是更適宜於用抽象力進行分析的經濟形態。可是，馬克思否定過經濟的細胞形態的研究麼？沒有，《資本論》恰是從對它進行的顯微鏡下的解剖結果說起的。馬克思否定過歐洲其他國度和民族存在著特殊的歷史發展麼？也沒有，《資本論》的序跋恰好都強調了這一點，而在實際研究中，作者討論資本主義早期的社會對抗，總用法國作為主要例證；討論農村公社的遺留形態，又總在注意俄國的例證。他這樣重視同一時代的不同空間的各種典型，難道不是對我們研究中國中世紀史

【二】《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郭大力、王亞南中譯本，頁×。

的一種啟迪麼？這種啟迪，我以為對於中世紀文化的考察更加重要。因為相對於政治史、經濟史和哲學、文學等專門史而言，文化史的研究中斷已久，許多門類的分解式研究都有待於從頭做起，而文化無論怎樣界定，都屬於某種整體意義的抽象，所以在這裡更容易發生無視時空連續性的毛病。比如說，關於「孔孟之道」在中世紀地位作用的某些估計，在我看來就既不顧歷史的時間進程，也不顧歷史的空間差異，用自我的臆想代替科學的抽象。

四

就文化史的研究來說，考察中國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紀，似乎更加煩難。五四運動前夕，魯迅曾描述道：「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

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二〕}以後毛澤東也作過類似的描述。他們都覺察到同時性的相對性，覺察到空間諸種差異的客觀存在，也覺察到改造中國不能忽視中世紀的乃至前封建主義的各種文化的矛盾衝突。然而，同樣不能否認，空間差異所顯示的不同時性，並非始於清朝滅亡以後，早在清朝建立以前，就已屬於事實。假定把「近代」定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出現以後的時代，那麼在中國的若干地區早有它的萌芽形態，便很難予以否認。

【一】《（隨感錄）五十四》、《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頁三四四。

五

域外的若干漢學家，很早就有一種看法，認為十世紀即北宋王朝建立後，中國社會曾進入「準近代」時期。用我們的術語來說，就是那時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形態。五十年代國內有的史學家，曾含蓄地表示接受這種看法，但隨即被斥作離經叛道，欲將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變作短期性，其心即可誅矣。這段公案不談也罷，但問題依然存在。比如英國學者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便從科學技術近代化始於何時的角度，對這種看法表示分明的同情。從那以後，在中國，只有經濟史家才敢小心地談論資本主義萌芽始於何時的問題。他們多半傾向於將時間定得富有彈性，說是大約萌芽於十六世紀後期到十八世紀晚期，以便隨時可以

逃遁到聖經的靈光圈下求得庇蔭，因為經書上說過中世紀社會內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這類的詮釋，卻向其他門類的歷史研究，提出一個合乎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既然承認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資本主義萌芽儘管老長不大，從明代萬曆到清代乾隆的二百多年間卻一直沒有枯死，難道對那個時代的中國政治和中國思想沒有發生作用麼？

六

當然可以對此置諸不理，可以繼續引經據典，道是鴉片戰爭時英國炮艦將中國大門打穿了五個窟窿，中國人才好奇地發現門外還別有世界；或者嫌

此說有失面子，道是還在英國炮艦沒有繞過好望角之前，中國便有人睜著眼睛看世界了——至於「第一個」是林則徐還是魏源，尚有異論。可是置諸不理難逃邏輯的追詢，引經據典也難服歷史的口聲。無論按照不顧面子還是保全面子的說法，只能引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由於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將自行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說法，始終只是一種假設，一種可能性。可能性不等於現實性，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早被宣稱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唯物史觀的起碼要求，就是尊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既然表示尊重歷史事實，卻又認定只有英國的大炮才將中國從中世紀的荒野打入近代文明的大門，那就無論如何不能不令人沮喪地推出下一個結論，便是中國人沒有能力自己邁進近代化，只可能「被近代化」。

七

假如「被近代化」的說法符合歷史實際，那麼這個結論儘管令人沮喪，歷史研究也只好表示承認。問題在於，良好的意向，憎惡中世紀的情緒，不僅不能代替歷史的事實，而且只能損害人們對於歷史的冷靜觀察。但原因也不能歸咎於情緒化認識。就主體反思，歷史研究的過細分工也難辭其咎。三十年前，近代的開端，即中世紀的終端，應定於鴉片戰爭發生的一八四〇年，終於獲得普遍認同。這個界定無疑具有充足理由，但也越來越像一道鴻溝，將中世紀研究與近代研究隔成兩個壁壘。結果呢？分工的畛域日趨板結，雙方很少越過那道一八四〇年線。但研究的邏輯取向，又必然使雙方非越過這道線不可，但多半限於思想的超越。為了論證邁進近代化是必要

的，便難免在回首時盡量指斥當年如何封閉、昏暗、落伍。但中世紀研究的習慣，卻是將王朝興亡作為一個觀察過程。既然清朝的內戰外侮主要都出現在後七十年，那麼先前二百年豈無一線光明？否則清代人士為甚麼會讚頌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呢？真所謂各吹各的號。沒有想到還有變調，說是雙方論證，恰好證明鴉片戰爭前夜中國處於超等穩態，非靠外力不能打破。一個社會，自上而下都自以為處於盛世，其實是處於衰世，它難道能依據內因而「自改革」麼？

八

恰好在鴉片戰爭前夕去世的詩人兼思想家龔自珍，彷彿有意提供證明一

樣，早在鴉片戰爭前四分之一世紀，便呼號清朝統治者汲取歷史教訓，「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二〕}但他提出了問題，隨即作了否定的回答，說是太晚了，清朝已入衰世，即治世的回光返照。看起來沒有一種現象不像治世，但整個社會自上而下全是平庸之輩在得意，豈止將相士農工商都平庸，連里巷的小偷、荒野的強盜也平庸。「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領，徒戮其心」，直到把人才的憂愁、憤慨、思慮、想有作為、想守廉恥、想潔身自好的所有感情理智全部砍殺精光，才會停止。人才不甘被殺，就日

【二】參看《乙丙之際箸議》第七篇，周予同主編、朱維鈞修訂《中國歷史文選》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頁二七。

夜呼號求治，但治世不可期，於是其中有叛逆精神的便日夜呼號求亂。倘若出現這種情形，那麼亂世不就在眼前嗎〔二〕？龔自珍如是說，當然令近代研究者高興，於是不顧他死於清英南京條約簽訂前的事實，硬派他充當近代的第一位詩人。但中世紀研究卻對他不屑一顧。難道他不是為了清朝「自改革」而故作憤激之言麼？難道在他以前戴震諸人不是說過類似的話麼？難道更早的黃宗羲、顧炎武輩不是提過比他更具體可行的社會改造方案麼？於是我們依然無所適從。

【二】參看《乙丙之際箚議》第九篇，周予同主編、朱維鈺修訂《中國歷史文選》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頁二七四。